

山
高
水
长



邱尚周★著

李运昌 烽火岁月

黄埔军校四期

湘南秋收起义

地下斗争

回延安

冀东大暴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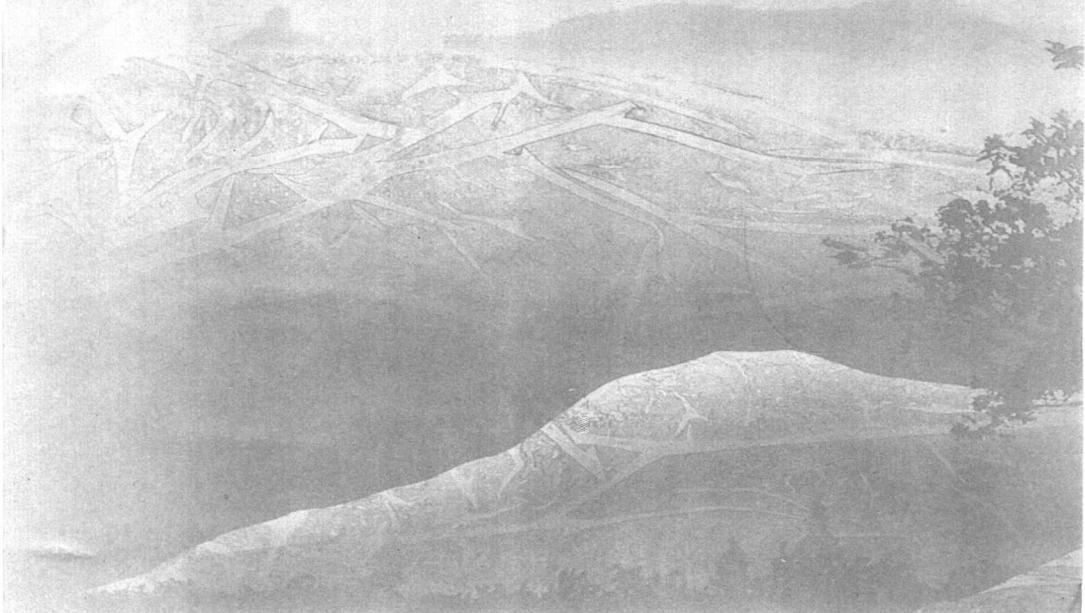
迎战冈村宁次

解放军出版社

山高水长

邱尚周★著

李运昌 烽火岁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高水长——李运昌烽火岁月 / 邱尚周著. —解放军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065-5047-4

[一. 山… 二. 邱… 三. 李运昌—生平事迹 四. K827 =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0870 号

书 名：山高水长——李运昌烽火岁月

作 者：邱尚周

责任编辑：吴述波

装帧设计：裴海斌

责任校对：王晓波

出版发行：解放军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：100035

电 话：66531659

E-mail：jf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：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A5

字 数：524 千字

印 张：19.625

插 页：2

印 数：3000 册

版 次：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5-5047-4/I·803

定 价：34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邱尚周

学者，1932年生，辽宁省辽阳人，祖籍山东。

1948年参加革命，1951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（原隶属东北民主联军）。

1952年进入高等学校工作，先后在北京矿业学院、淮南矿业学院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、中国煤炭经济学院（现山东工商学院）等四所大学从事编译、教学、科研工作。在较长的时间里从事哲学研究。

1983年11月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院长，开始从事教学管理工作，1994年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离休。

离休后开始从事文艺创作。



李运昌在工作(1996年)

李运昌现为
■ 全国黄埔同学会会长
■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
■ 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



李运昌 1926 年黄埔军校毕业后



冀热辽军区领导(左起李运昌、李中权、詹才芳、彭寿生)



1964年初春李运昌与夫人合影



全家福，1949年承德(热河省)时任省委书记、省长、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
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

序

邱尚国同志以一颗火热的心，
记叙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烽
火历程。

希望这本书能进引人向上的
《山高水长》对今天的和明天的
战士能有所启迪。

李运昌

2003年深秋，本书完稿后，作
者请李运昌审阅，李运昌欣然为本书
作序。

楔子 结识李运昌

我认识李运昌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。具体是在哪年哪月认识的，那可就说不清楚了。大约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东北四省，还建立了什么“满洲国”的时候吧。

在那悲惨的日子里，鬼子占领军除了逼着我们老百姓承认自己是“满洲国国民”之外，还逼着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讲什么“亲善”，讲什么“协和”。不和鬼子讲“日满亲善”和“日满协和”的，那是“政治犯”或是“国事犯”；一时出语不慎，触犯了鬼子编造的“亲善、协和”的鬼话者，那是“思想犯”；偷吃大米、白面的，那是“经济犯”。

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被蹂躏的中国老百姓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掉进占领者设置的“党匪”、“赤匪”、“共匪”、“兵匪”、“民匪”的嫌疑圈套里，就会丧命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接触，那是“通匪”，是顶天的大罪。

“通赤匪”的，让日本占领军发现了，必死无疑，肯定要被杀头，割下来的脑袋还要挂在高处示众。别看那时我年纪小，鬼子兵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恶，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，记得很牢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那时候，我家住在离乐亭县城有 80 多里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的小山村里。十几户人家的茅草房舍，像癞蛤蟆似的，稀

稀落落地匍匐在从东到西大约有三里长的平原上。

别看我们的村庄小，但她有个大名字，叫“头一站屯”。她不是汽车站，也不是火车站，是“兵站”，是传说里的兵站，好像是金代的一个兵站，但是没有留下古兵站的一点痕迹，也许有遗存深埋在地下，但是至今没有被发现。

故乡的村前有条小河，清澈见底的河水不舍昼夜地在河床上嬉戏。我曾经在那小河里打过鱼、捉过虾、摸过螃蟹什么的，还在小河里和小河的岸边上寻找过我喜爱收藏的艺术精品——五颜六色的鹅卵石。

那条小河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是个五彩缤纷的世界，我一直钟爱着家乡那条美丽的小河。她的名字叫小汤河。

在小汤河的南面，挺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名叫大南山。大南山上的森林，一年四季老是呼啸着、横扫着它们头顶上的那块蓝天，仿佛一定要把那广阔无垠的苍穹洞穿。有时，森林也和白云游戏，但是调皮的白云总是玩耍一会儿就散了。大南山上的莽莽森林昂着头不倦地呼啸着，不分春夏秋冬。

听老人说，在大南山里，居住着多种多样的飞禽猛兽，后来证明那是不争的事实。在大南山脚下，我亲眼见到过狼和野猪成群地奔跑。有时，狼群还出现在我和我的学友们上学的路上。

在大南山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，残留着一座古城遗址，村里的孩子们常到那里去玩耍，去找寻埋藏在地里的古钱币、玉器什么的，虽然往往什么也找不到。爷爷带我到那里去过几次。爷爷站在古城墙上给我讲述过那座古城的佚事。爷爷讲的故事，我已经忘掉了，但是爷爷告诉我那里有狼、狼会吃人的话，我却没有忘记。爷爷的警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我相信，狼真的会吃小孩儿的，小孩子肉嫩好吃。因此，大南山古城遗址那块宝地，我一个人从来不敢去，怕被狼叼走吃了。

蜷缩在小汤河北岸的那十几幢农舍、那条无忧无虑地向前流淌着的小河、还有那莽莽苍苍日夜不停呼啸着的大南山，以及那村北

头平原上生长着茂盛的玉米、大豆、高粱的田野，那里头处处都蕴藏着壮烈的史诗，都充满着动人的歌谣。在小汤河南面的高山上、村舍旁的打谷场上和神秘的青纱帐里，到处都有抗日义勇军和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足迹。

一个稚嫩的、孤寂的男孩常常在小汤河边玩耍。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小河的岸边观赏小河里的小鱼、小虾、小蝌蚪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戏。他特别喜欢观赏水底鹅卵石上絮状小草摇摇摆摆地跳舞。有时候，他独自坐在小河旁，幻想自己若能变作一条小鱼，那该有多好，又好玩又不受日本鬼子的欺侮。但是，当他从梦幻中走出，觉得人类是不能变作鱼类的，又感到痛楚和忧伤。

有时候，他想也许有一天游击队会从大南山的树林子里头钻出来，把日本鬼子和汉奸卖国贼全都消灭光，搭救他们出苦海。

那男孩时常仰着头，看着林涛怒吼的大南山，心里头发急，盼望着游击队快出来。如果游击队老是不来，他计划自己去大南山里找他们，就算是给狼吃掉了也无所谓。他坚信，找到了游击队，他们就一定会带他下山打鬼子。

有一天，那男孩坐在自家打谷场的一个石磙上，经过认真观察，断定游击队已经来过了，就藏在大南山的丛林里。那男孩站起来，转身快步向着自家门口方向跑去，向他的家人报告他刚刚得到的好消息。那男孩不是别人，就是本书作者，20世纪30年代的我。

关于游击队已经来了、就藏在大南山的密林里头的事情，我首先偷偷地告诉了爷爷。爷爷听过我的报告，只是哀叹了一声，立即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并且流下了眼泪，是成串的眼泪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至今依然觉着，爷爷那天流的伤心泪水点点滴滴都流进了我的心坎里。

不管爷爷怎么讲解，我就是认定那南山里头真的藏匿着游击队，是夜里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是来搭救我们的。

游击队并没有露面，但我的期待也没有消失。

从此，期盼、惆怅和烦恼一直伴随着我。

记不起又过了多久，只记得爷爷告诉我，说我又长了一岁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个挎着大洋刀、戴着大盖帽、当“满洲国”警察的外姓哥哥。

那个回家过大年的外姓哥哥，在村子里见人就敬礼，挺神气的，有派头。村里有人夸他有礼貌，也有人说他是“猪鼻子里插葱——装象（相）”。

我爷爷说：“当汉奸的，哪有好货，都不是物件。”我爷爷老是躲着那个哥哥，不见狗汉奸。

那哥哥脸皮厚，到过我家好多次，一定要拜见我爷爷。爷爷性子倔，坚决拒见。有一次，爷爷在街上和那哥哥碰了个面对面。爷爷囿于长辈的名分，只好和他点头答话。也真奇怪，有了那次谋面，爷爷居然和那哥哥作过几次彻夜长谈。

大年过后，警察哥哥回县城去了。他走后不久，有一天夜里来了许多日本兵和“满洲队”（在我们家乡，老百姓把伪满国军叫“满洲队”），把警察哥哥的家围个水泄不通，翻箱倒柜搜查了大半天，也没有搜到什么罪证。最后，日本兵把他爹捆走了，并且把他家的房舍放火烧了。

事后，村长召集各家各户开会，宣布那位警察哥哥投靠“赤匪”大首领李云长去了。

既然那哥哥投靠了“赤匪”，爷爷也就把他和那哥哥说的悄悄话都端了出来。爷爷和哥哥谈了好几个晚上，讲的都是大忠良李云长的故事。

那年冬天，到了晚上吹灭了灯，爷爷便跟我讲李云长的故事，足足讲了半年多，我现在依然能记得其中许多的故事情节。现在回忆起来，爷爷给我讲的李云长的故事，是爷爷经过加工、整理过的，便于我理解。

爷爷说李云长是天上的一个什么星宿下凡，在天上比关老爷的官位还高出三品。李云长，红头发，红眉毛，红眼睛，红皮肤。他

的心和胆都是红的，叫做什么赤胆忠心。李云长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红色的，他带领的部队叫红军。

关里的民谣唱道：“李云长，大忠良，骑红马，挎大枪，打日本，捉豺狼，乐得人民喜洋洋。”

据说，李大将军带的红军能飞檐走壁，能腾云驾雾，能钻进地里行军。当地老百姓把李云长大将军的队伍叫游击军、飞行军、地下军。

自从听爷爷讲过李云长的故事，我天天都期盼着李云长带领红军来俺们村，来搭救我们，来打日本侵略军。

爷爷讲，有一次日本鬼子兵和伪满“铁石”部队的几万大兵把李大将军的队伍团团围住，日寇小林部队长欣喜若狂，大喊大叫：“把李云长的‘匪军’统统地消灭！统统地，统统地消灭！”

然而，鬼子兵合围以后，李云长部队不见了，连“八路”的影子也没找到。小林部队长心里头纳闷：“李云长的队伍哪里去了？难道他的部队上了天，入了地？”小林一怒之下，砸碎了自己的望远镜，还赏给他的下属分队长两记耳光。

“鬼子哪里知道，李云长的兵法有九九八十一条，拿出几条就能把日本鬼子兵灭了。日本侵略者想灭亡中国根本办不到，亡我东北也是办不到的，占领我东北也是暂时的。”听爷爷这样说，我非常开心。

也不知道日军和伪军擒住过“赤匪”李云长多少次，李云长也不知道被日军和伪军击毙过多少次，而李云长依旧领导着冀热辽军民抗击着日本侵略者。

我爷爷笑着对我说：“李云长是大命人，刀枪不入，鬼子哪能抓到他。”

有一天晚上，天有一点点凉，爷爷把我搂在怀里，对我说：“有一个日本走狗、天良丧尽的小汉奸、名叫‘野狼’的密探，向日本军官报告，说他亲眼见到了李云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迁安县西庄，连一个警卫也没带。”

日本人当然不敢相信“野狼”的情报，李云长一向行动诡秘，来无踪去无影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发现呢？

“野狼”对日本军官说：“李云长他就是化成灰变作泥，我也能认出来。他刚进西庄，我亲眼见到的，捉不到李云长，你砍了我的脑袋。”

最后，日本军官信了，调来大批日本兵，把西庄围个水泄不通、密不透风，连个苍蝇也别想从村里飞出来，然而鬼子兵挖地三尺也没找到李云长。实话实说，李云长就是站在敌人的眼皮底下，敌人也认不出来。因为，李云长能变成老百姓，老百姓也能变成李云长。老百姓都说，李云长能和民众打成一片，鬼子到哪里去找李云长？

爷爷老是说：“中国多几个李云长就好了，我们就不用受这么多的罪了。”

我问爷爷：“李云长多咱来我们村呀？”爷爷说：“李云长会来的，会来搭救我们的。他先把关里的鬼子兵消灭光，就会到我们关外来。”

爷爷还说：“辩证法是李云长手里头又一大法宝，这是历史上任何兵家所不具备的。听说共产党人手里头都有辩证法，不过有的共产党人操练得好一些，有的共产党人操练得火候欠一些。李云长操练辩证法的火候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是操练辩证法的大师。”

爷爷在世的时候，给我讲过很多的故事，可以说，我是在爷爷的故事里长大的。非常可惜，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故事，大多被我忘记了，否则我一定编辑一本《爷爷讲过的故事》，给今天的孩子阅读，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。

然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惟独关于李云长的故事我不曾完全忘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身高、体重一年比一年增加，藏在我心中的关于李云长的故事也在不断地成长。

小时候，时常在梦里见到李云长和关云长在一起唠嗑，有说有

笑的。看得出来，他俩相处得怪亲热的。两位红脸汉子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他俩都说了什么。

我曾经想听听他们都唠扯什么，甚至想和他们扯上几句，他们都是挺和气的人。可是，爷爷板着脸告诫过我：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能插嘴”。所以，我没和李云长、关云长搭过话。但是，我估摸，他们唠扯的准是打鬼子的事儿。

我猜想，难怪日本人把李云长、关云长他们叫“赤匪”，原来他们的皮肤是红的，历来忠良都是红皮肤。爷爷说我猜对了，“赤”就是“红”的意思。

我对爷爷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也去当‘赤匪’，像李云长和关云长那样。”爷爷笑了，他说：“好，好呀，你长大了，去当‘红军’。”

爷爷还告诉我，李云长和关云长不可同日而语，不是一码事。怎么不是一码事？我想，可能是李云长的脸比关云长的脸更红一些吧。

天长日久地思来想去，我觉着我的皮肤也在渐渐地变红，但是不像李云长和关云长的皮肤那样红。我心里头多少有点急。能不急吗？我也是个忠良呀！

在我的幼小心田里，爷爷埋下的红色种子，正在生根、发芽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被鬼子捕去投入监狱，定为“经济犯”，因为不愿意穿日本鬼子配给中国人的“更生布”，自己私下买了几斤棉花，就成了阶下囚。

爷爷谢世不久，我爹、我妈从煤矿回到了家乡继承祖业务农。

1945年8月，李运昌将军率领三路大军与苏联红军配合，先后解放了辽宁、热河全省，以及吉林、黑龙江两省的西部，消灭了大量鬼子兵和“满洲队”，接管了这些地区的许多城市，如山海关、锦州、沈阳、抚顺、辽阳、鞍山、本溪、营口、通化、开原、四平、齐齐哈尔、白城子、承德、赤峰、朝阳、阜新等地。

当时，李运昌的名气威震四方，报纸上报道，说李运昌就是李

云长，李云长就是李运昌。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痛痛快快地乐了好几天。

我对我爹说：“我认识李运昌。”

我爹笑了。

我本来计划去沈阳看望李运昌将军，但是终于没能如愿。

我爹说：“小孩子别胡思乱想。”

15岁那年，我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。当时，除了李运昌、杨靖宇以外，我知道共产党里还有朱毛，而且知道朱毛不是一个人，是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人，他俩是好朋友。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是林彪，李运昌是副总司令。然而，当了几年兵，直至共和国成立，我始终没有见到李运昌将军。

参军以后，我对“红”有了新的领悟，它是革命、忠贞、无私奉献、英勇无畏的象征。不向革命索取什么，对工农大众忠贞不二，打仗不怕死，一辈子甘当人民的仆人，给老百姓担水扫院子等等都是“红”。

在部队里，我把曾经企盼自己变成红皮肤、红头发、红眼睛的幻想讲给教导员和战友们听，同志们乐了好多天。

共和国建立后，李运昌奉调到国务院工作，那年我由东北局调到北京，被分配在一所大学里工作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回老家探亲，看望年近古稀的老父老母。我爹问我“在京城见到李大将军（父亲这样称呼李运昌）没有？”

父亲想想说：“你的职位低，大概见不到李大将军。”事实正如父亲所言，我的职位低，无缘会见李运昌。1949年底，李运昌任交通部党组书记、常务副部长，我是一名一般干部。李运昌好比天上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，我是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一名青年。李运昌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我爹是这样界定我和李运昌的关系的：1945年以前我是梦识李运昌，1945年以后我是神识李运昌。没有谋面，不能算结识和相识。

我爹说，伟人身上有许多常人身上所没有的亮点，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永远闪烁着光芒的明星。父亲希望我有机会去拜见李运昌，结识李运昌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。明星依然光芒闪烁，我依然默默地仰望星空。

不是我没有拜见李运昌的机会，也不是没有拜见李运昌的勇气，而是我觉着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占用李运昌将军的宝贵时间。

多年来，李运昌和我同在北京工作，而且两家的住所相距并不甚远，但是会见李运昌的夙愿始终没能得偿。

李运昌是功在国家的人民英雄。1938年，李运昌和他的战友靠3杆长枪开创冀东抗日根据地，到1944年，冀东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。

李运昌、包森、刘诚光、李楚离、李中权、彭寿生、詹才芳、陈群、王平陆、李子光、魏春波、周文彬、丁振军、苏林彦、曾克林、苏然、谷云亭……等众多英雄率领冀热辽军民，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辖区内，建立了25个联合县的人民政权，抗日军队发展到3万名，群众武装（民兵）发展到20万人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为560万，共产党员为5万名，牵制了日、伪军达10万之众，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，李运昌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、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。

1945年10月，东北人民自治军（不久改为东北民主联军）宣告成立，林彪出任司令员，吕正操、李运昌、周保中、萧劲光任副司令，彭真任第一政委，罗荣桓任第二政委，程子华任副政委，萧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，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。

1946年1月，李运昌返回热河，与程子华、肖克、罗瑞卿等同志一起创建新的冀热辽根据地。李运昌由辽宁返回热河时，带回三个步兵旅和一个野炮团，组成热辽纵队（即黄永胜纵队），其余在南满和沈阳的老部队和新扩编的部队，大约5万名全部交给了东